

唐长孺社会 文化史论丛

唐长孺 著

本书主题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地区间差异及这一时代南方社会文化对于北方的影响,涉及相关时代的思想、文学、宗教、社会风俗等问题。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武汉大学出版社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

唐长孺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唐长孺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3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307-02954-5

I. 唐… II. 唐…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IV. K235.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873 号

责任编辑: 张俊超 责任校对: 黄添生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 湖北省黄冈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35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2954-5/K·231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1932年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先后任职于多所中学。1934年任上海光华大学讲师，1942年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副教授。1944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其他社会兼职有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等。主持点校北朝四史、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三编）》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唐书兵志笺证》、《三至六世纪江苏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居存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编委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侯杰昌

卓仁禧 张清明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王吉玉 王维克

田德诚 朱英国 刘花元

江 春 李文鑫 余劲松

冻国栋 张清明 陈恕祥

杨弘远 卓仁禧 周茂荣

郑传寅 胡树祥 胡德坤

查全性 侯杰昌 郭齐勇

陶德麟 彭斐章 熊玉莲

- 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 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
-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
- 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研究
- 哲学研究方法论
- 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
- 邓小平哲学研究
- 社会认识方法论
- 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
- 国际经济法概论
- 国际私法
- 国际组织法
- 国际条约法
- 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政策
- 比较外资法
- 比较民法学
- 犯罪通论
- 刑罚通论
- 中国刑事政策学
- 中国冲突法研究
- 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修订版)
- 比较宪法学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 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建构
- 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
- 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
-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
- 非农化及城镇化理论与实践
-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研究
- 西方利润理论研究
- 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
- 宏观市场营销研究
- 经济运行机制与宏观调控体系
- 三峡工程移民与库区发展研究
- 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与发展
- 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探索
- 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 中日战争史
- 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
- 汗简注释
- 国民军史
- 中国俸禄制度史
-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
-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 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
- 清代军费研究
-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 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
-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 法国文明史
- 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
-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
- 文言小说高峰的回归
- 文坛是非辩
- 评康殷文字学
-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修订版)
- 法国小说论
- 宋代女性文学
- 《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
- 社会主义文艺学
-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 现代情报学理论
- 信息经济学
- 中国古籍编撰史
- 随机分析学基础
- 流形的拓扑学
- 光纤孤子理论基础
- Banach 空间结构理论
- 电磁波传播原理
- 计算固体物理学
- 环论
- 近代鞅论
- 鞅与 Banach 空间几何学
- 现代偏微分方程引论
- 算子函数论
- 随机分形引论
- 电磁理论中的并矢格林函数
- 穆斯堡尔效应与晶格动力学
- 植物进化生物学
- 广义遗传学的探索
- 水稻雄性不育生物学
- 随时机过程论

目 录

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	1
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	13
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	47
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	58
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	86
读《颜氏家训·后娶篇》论南北嫡庶身分的差异·····	101
读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序》论江南风俗·····	113
读《李波小妹歌》论北朝大族骑射之风·····	117
《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	121
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	125
《太平经》与太平道·····	133
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	144
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	157
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	176
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	185
南朝高僧与儒学·····	195
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205
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	233
《木兰诗》补证·····	243

读王梵志诗偶见	251
《兵车行》写作年代质疑	258
金代收继婚	265
跋明张璁书扇	269
《北齐书》点校后记	278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前言	284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前言	286
后 记	288

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

东汉末年，刘表统治荆州（治襄阳）十九年（公元196～公元208年）。在此期间，荆州是一个政局安定，经济发达的区域。刘表是个儒生、名士。当时人说他“岂拨乱之主”，“无霸王之才”^①，只是志图自保，然而也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荆州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

那时，黄河流域割据群雄相互混战，社会生产几乎全部停顿，城市破坏，田野荒芜，弄得“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②。荆州却生产正常进行，并且由于关中、兖、豫各地人民大量避乱到荆州，他们开辟荒地，“深山幽谷，于是为邦”^③。在北方严重缺粮，到处饥荒的时候，荆州却有充裕的粮食，北方城市残破，官私手工业几乎全部消失，大批手工业者也逃入荆州。“百工集趋，机巧万端”^④。尽管这些颂扬的话不免夸张，但荆州社会经济没有遭到破坏，而在当地和北来人民的劳动下还有所增长，应是事实。

在政治安定，社会经济有所增长的基础上，刘表有可能兴办起学术文化事业。

那时避乱而来的士人相当多，刘表可能由于怕引起侨土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益州非常尖锐，冀州也存在），也可能他认为外州人不可靠（曹操占有兖豫，献帝都许，有的人确实归心曹操），他在政治上几乎绝不任用他们，王粲批评他不能任用海内之士^⑤，确是事实。然而刘表还是力图延揽这些才士儒生，《后汉书·刘表传》说：“关西、兖、豫学士归者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数以千计的“学士”聚集在荆州使荆州代替

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并且发挥他们的专长，开展学术文化事业。

在洛阳太学毁废之后，刘表在襄阳建立学校，设置学官。《刘镇南碑》说：

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

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说^⑥：

乃命五业从事宋衷（亦作宋忠）所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三百余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脱介免胄，比肩接踵，川逝泉涌。

从这二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入学生徒大致分为二类，一是碑文所谓“吏子弟”，亦即《文学记官志》的“童幼”或“总角佩觿”，那是幼年的官吏子弟，二是碑文所谓“受禄之徒”，大致是低级官吏，据《文学记官志》还包括“武人”，他们“脱介免胄”而入学。

汉代诸州不置学校，郡国虽置学，大多是虚名，一州设置学校是前所未有的，其规模虽然远不如洛阳太学，制度却模拟太学。东汉初就曾为“功臣子孙”及“四姓末属”（外戚）别立校舍，选其中学业高的受业。还有“期门羽林之士（禁卫军），悉令诵《孝经》^⑦。荆州学生徒中的“吏子弟”相当于“功臣子孙”，“武人”相当于“羽林、期门”。碑称“洪生巨儒，朝夕讲诲”，似乎入学并非虚名。《文学记官志》最后序列五经的要旨，大概这些儒生也同旧时博士一样分经讲授，虽无五经博士之名，实际上也即是五经博士。宋忠任五业从事，五业即五经。这

也是新设置的僚佐，主掌学校和撰述之事，由于设置学校的同时也设置学官，所以王粲撰文题为《荆州文学记官志》，“文学”不仅指经学而且是一个机构，避太学之名而称之为文学，《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便径称刘表“开立学官”，而王粲写的是《官志》。

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第二件事是改定五经章句。《刘镇南碑》称：

深悯末学违本离质，乃合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几者多。

这是一种经学教本，名为《五经章句后定》，主要是删除被认为不切要的所谓“浮辞”，使学者得以在较短时间内通晓经文。早在东汉初桓谭等就已指责章句烦琐。也一直有人进行简化，但只是私人对某一经而作，像这样五经并举，集合许多儒生共同改定章句却还是第一次，为唐初修纂《五经正义》的先河。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争，尽管东汉时古文经传习日益流行。但列于学官的仍只今文经的流派，所谓“十四博士”。古文经学家多次建议与今文并立。均未被采纳，直到熹平四年立石经于太学门外作为典范，仍然是今文诸经。这次改定章句，虽然由于全书早佚，内容不详；清代易学家张惠言据留存来的零碎条文，推断由刘表署名的《周易章句》所据为古文费氏易。东汉中叶以来私家注易如马融、荀爽、郑玄本已多主费氏易，但作为官定教本也是第一次。如果《英雄记》所云刘表在荆州确曾“开立学官”，则也不妨说为古文易立于学官之始。魏晋以后，王肃、王弼、郑玄注《周易》先后立于学官，虽然解释各不相同，却均用费氏易，《五经章句后定》是开端。

这套书是官学教本，随着荆州政权的灭亡，学校不复存在，书也不再行用，魏晋间人未见征引。永嘉乱后，大概也和许多书

籍一样，全书佚失不传。梁代尚存署名刘表的《周易章句》10卷，隋代又只存5卷。此书当即是《五经章句后定》中的一种。隋代还有刘表《新定礼》1卷，应即《仪礼章句》的残本^⑧。这三种残本宋代又都佚失，现在见到的只是唐人著作中征引的若干零碎条文^⑨，其他诸经就一无所知了。但是我们不妨作一点推测。

《周易章句》和《新定礼》均由刘表署名，说明全书由刘表以荆州牧身分主编，今古文的抉择，解释的异同，应由刘表裁决。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后段述五经要旨，可能代表刘表的意见，其中叙《诗经》云：“摘风裁兴，藻辞谲喻。”按《毛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王粲似即概括其义。又叙《春秋》云：“一字见义，五石、六鹁以详备成文；雅门、两观，以先后显旨。”显然是用《公羊》义^⑩。这一推断如果能成立，则《五经章句后定》中诗用古文《毛诗》，《春秋》用今文《公羊传》。

刘表开展学术文化事业的第三件事是搜集图书。

《刘镇南碑》云：“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古典坟籍，充满州闾。”^⑪当时北方大乱，洛阳官寺藏书在董卓乱时全部毁灭，私人藏书当时也一样，其他地区屡经兵火，图书必然大量被毁，荆州没有什么灾祸，私人所藏和四方人士携带而来的书籍必定不少，经过搜集，荆州官府藏书无疑为全国之冠，后来刘琮降附曹操，襄阳并未破坏，赤壁战后，襄阳也没有丢失，曹操是爱好读书，手不释卷的人，决不会抛弃，北还时想必运载到邺^⑫。魏晋中秘阁藏书恐怕不小一部分乃得自荆州。

设置学校，开列学官，改定五经章句和搜集遗书，对于开展荆州学术文化事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荆州之成为全国学术中心更重要的是对其他地区和今后产生的影响，而这却非上述这些活动所能尽。

各种史籍都提到五业从事宋忠（亦作宋衷），他大概是撰写

《五经章句后定》的具体组织者，据《经典释文》序录，他是南阳章陵人，字仲子。当时荆州古文经学盛行，他是一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另一位是侨居襄阳的颍川人司马徽，《三国志·尹默传》：

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即司马徽）宋仲子（即宋忠）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

和严默同往荆州问学于司马徽宋忠的还有他的同乡李仁，同卷《李撰传》说李仁的儿子李撰“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旨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⑩，他没有见到王肃的著述，而“意归多同”。

从上引记载中我们看到益州古文经学是由荆州传入的。尹、李二人游学荆州的时间正当刘表大兴文教、儒生云集之际，那时荆州学业之盛为远方所向往，二人从司马徽、宋忠等“受古学”，司马与宋当然是古文经学大师，下面还有个“等”字，则传授古文经学的还有他人，可以推知荆州盛行的是古文学，继承贾逵、马融，与流行于黄河流域的郑学相抗衡。宋忠专长是《周易》以及与易相通的《太玄》。李撰著作中也有这二种，想必出自宋忠。司马徽以善于识拔人才著称，无著述传世，但他确也传授门徒，蜀汉名臣向朗（襄阳宜城人）年轻时就曾从他问学，刘廙十岁“戏于讲堂”，司马徽大加赞赏^⑪，所谓“讲堂”疑即刘表设置的学校，司马徽是讲学的“洪生巨儒”之一。

尹默专精《左氏春秋》，必传自荆州，当时善于《左氏春秋》的颍容正在荆州讲学。颍容是陈国长平人，《后汉书·儒生传》说他“博学多通，善《左氏春秋》，师事太尉杨赐……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他著有《春秋左氏条例》。尹默

有可能即从颖容受业。颖容是当时有名的《左氏传》专家，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说》“未有颖子严（疑容字）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歆）、贾（逵）、许（惠卿）、颖之违以见同异。杜预举左氏之学只此四家，认为值得驳正失误。

颖容在荆州讲授《左氏传》当然起了传播推广作用，但荆州本来就盛行《左氏传》，蜀汉另一个名臣来敏“善《左氏春秋》”，他是南阳新野人，入蜀在刘璋时^⑩，来敏算不上专家，却有个有名的专家谢该，他是南阳章陵人，声名不下颖容。《后汉书·儒林传》叙谢该云：

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任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欲归乡里，以荆州道断不得去，少府孔融上书荐之……书奏，诏即征还。

按谢该开门授徒想必在乡里。他任公车司马令疑在长安，随献帝迁许，而父母在荆州，才托病还乡，孔融为少府，亦在建安初。他虽不预刘表立学和改定《五经章句》之事，却足以说明荆州早就流行《左氏传》之学。

本传叙河东人乐详从谢该质疑事，《三国志·杜畿附子恕传》记杜恕被诬迁谪，死后，“甘露二年（公元657年）河东乐详年九十余，上书讼畿之遗绩”，因此朝廷封杜恕为丰乐亭侯。注引《魏略》记乐详事迹，说乐详向谢该请教后还河东，太守杜畿任他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曹魏初，他在洛阳任博士，正始中（公元240~249年）以年老罢官还乡。按乐详和杜家关系很深。杜预专精《左氏传》，是以传合注的创始人，他自称有“左氏癖”，可能年轻时受乐详的影响，则与荆州之学也不无关系。

荆州学人中最著名的是宋忠，不仅为古文学西传益州的主要

人物，而且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的北方的邳下、洛京也传播他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宋忠的著作有《周易注》10卷、《世本》4卷、《法言注》13卷、《太玄经注》9卷^⑧。这些书只有《世本》称“撰”，那是因为不仅作注，而且还据《史记》补缺。据此知宋忠不仅研经，而且也旁及子史，所以尹默传自荆州者也经史并举。

他的《周易注》在《隋书·经籍志》中与刘表《周易章句》并见（只据梁代书目《七录》转载，隋代已亡），张惠言《易义别录》据散见条文，说二书均为费氏易而刘表书接近郑玄，宋忠书接近荀爽，如张氏之说可信，则内容显有差别。据上《李撰传》，荆州之学继承贾、马，与郑学不同。宋忠虽然是改定《五经章句》的主要组织者，但议论异同，最后必由刘表裁决，《周易章句》接近郑说，当是刘表之意，也如荆州流行《左氏春秋》而《周易章句》中的《春秋》有用《公羊传》的迹象。宋忠《周易注》传入江东，虞翻比较郑、宋二种《易注》说“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⑨。虞翻五代传今文孟氏易，而汉末诸家注易大抵都用费氏易，所以他对马、郑、荀、宋都没有好评，只对荀爽注说了一句“有愈俗儒”，那可能因为荀也兼采孟氏之故，对于宋忠注认为比郑玄略胜一筹或因宋注接近荀氏。虞翻历举四家而署名刘表的《周易章句》却一字不提，当时刘表与孙氏使节往来，宋忠的《太玄经注》即由使人携来，刘表《周易章句》虞翻应当见到，可能认为郑玄已不足取，接近郑玄的不值一谈。

宋忠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可能是《太玄经注》。扬雄这一著作极受张衡的推重，认为“乃与六经相似，非传记之属”^⑩。张衡是南阳西鄂人。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注意这本书，引起南北学人研习此书兴趣的实由于宋忠作注。晋范望《太玄经注》首载陆绩《释玄》，据陆绩所述他年轻时曾“访求玄本，不能得”。后来刘表派遣使人成奇来吴，带有《太玄经》，他才得传录。以后曾想作注，未成。成奇第二次奉使，宋忠请他随带所著《太玄解

(即注))送给张昭。陆绩也就见到了宋注。陆绩说:“仲子之思虑诚为深笃,然玄道广远,淹废历载,师读断绝,难可一备,故往往有违本错误。”因此他们以宋注为本,别自为注,凡认为宋注正确的一仍其旧,认为错误的“释而正之”,其体例似乎是保留原注,认为不对的,陆文纠正。他说:“所以不复为一解,欲令学者瞻览彼此,论其曲直,故合联之尔。”陆绩最不满意的一点是:

夫玄之大义,揲著之谓,而仲子失其旨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书曰:“若网在纲,有条而弗紊,今纲不正,欲弗紊不可得矣。”

这段话很重要,《太玄》原是“揲著”之书,但宋忠却不探究“休咎之占”,而只讲“文间义说”,即解释文字和理解文意。陆绩认为这是“纲不正”,陆绩才有《周易注》,主京房、京氏易专讲阴阳灾异占验之术,他非议宋忠注《太玄》不谈占验自不足怪。那时虞翻也见到了宋忠《太玄注》,陆绩还肯定宋注“思虑诚为深笃”,虞翻却绝无一语称道,并且还“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⑨。虞翻是孟氏易专家,孟氏易也讲阴阳灾异,与京氏易相通,他不满宋注,大概也与不讲占验有关。

尽管虞、陆都不满宋注,但《太玄》是从荆州传入的,二人注释《太玄》也因宋注的传入而引起,仍然反映了荆州学术的影响。

荆州降后,宋忠北迁,《三国志·王朗附子肃传》称“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这是又一种《太玄注》。王肃的《太玄》之学直接受自宋忠,他所以要“更为之解”,或由于不满宋说,或是推阐宋说,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我们不知道,总之是在宋忠的影响下作的。

扬雄这本书二百年来的束之高阁,连传本都稀少,而几乎同时却出现了四种注本(蜀汉李撰的著作中也有《太玄》,尚不在

内)。为什么忽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呢？我想这与研习《周易》有密切关系。《太玄》本就是拟《周易》而作。注《太玄》是注易的余绪。注玄四家都注《周易》，除王肃外其他三人都专精易学。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一点。四家注《周易》各有所主，因而解释《太玄》也存在着差异。虞、陆两家就是以孟氏、京氏占验之术来非难宋忠。我们不妨说他们注《太玄》主要不是为了表彰扬雄的学说，而是为了推阐自己所得的易学。

宋忠注《太玄》不重占验，可以推想这也是他注《周易》的倾向。张惠言说宋注《周易》“出入荀氏”^⑨。按《太平御览》卷608载颜延之《庭诰》云：“易首体备，能事之渊。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颜延之以荀爽与王弼并举，以为“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张惠言说宋忠注《周易》“出入荀氏”，自必也“略其象数”，正与注《太玄》的旨趣一致，讲易而略象数占验是时代性的新倾向。汉人讲易，不管主今文或主古文，没有一个不谈象数占验，即荀爽也不免兼采孟氏。宋忠所处的时代毕竟还不是王弼所处的时代，当然不能像王弼那样尽扫象数，但毫无疑问，他在《太玄注》中贯彻了宋忠的但明“文间义说”而“略休咎之占”，必然在《周易注》中也有所体现。

王肃曾从宋忠读《太玄》，后来“撰定父朗所作《易传》”^⑩。据张惠言说，王肃一向攻击郑玄，但《周易传》中的训诂大义却十分之七取之马、郑，“疑其出于马、郑者之学也，其掎击马、郑者肃之学也”。按《南齐书·陆澄传》载澄与王俭书有云：“泰元（即东晋孝武帝的太元年号）立王肃易，当以在（郑）玄、（王）弼之间。”张惠言说王弼注易“祖述肃说，特去其比附爻象者”。是否可以说，王肃《周易传》中采用马、郑说者为王朗之学，接近王弼的出于宋忠呢？荀爽、宋忠、王肃、王弼之间似乎有一条脉络可寻。

东汉学业散在家门，开门授徒者都在乡里，私家讲学之盛及其成效远远超过洛阳的太学，如实地说，本来没有什么学术中